

清朝乾隆年间开始,云南每年运铜至京,所经陆路2200余里,水路8200余里

关山万里 滇铜京运

刘鸿燕

今年1月,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、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《云南省“十四五”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》,制定了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“十四五”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,在加强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中,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滇铜京运等区域性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,扎实推进集中连片保护发展试点示范工作。

滇铜京运,史称“南铜北运”,始于清雍正五年(1727年),终于宣统三年(1911年),前后历时185年,是关系清王朝财政金融兴衰成败的要政、大政,每年云南各府、州、县铜厂,完成额定的总计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(633.144万斤)京铜,经由各地铜店集中,转运至东川铜店(东店)和寻甸铜店(寻店),途经云南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,然后转入运河,经山东,渡黄河进入河北,最后由天津进入通州,直抵北京。其间,途经今天的11个省市,贯穿大半个中国,水陆联运,跋涉万里,故称“关山万里运京铜”。滇铜京运以其运程遥远、道路艰险、运量巨大、运时漫长,动用人力物力庞大,运制完备,持续长久,影响深远,贡献巨大,创造了“今古奇观”,也在云南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璀璨的篇章。

滇铜京运的历史背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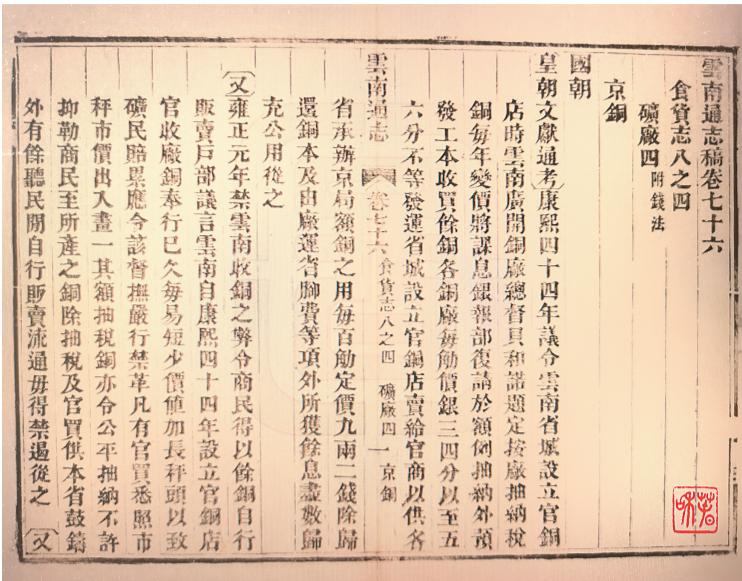
清代沿袭明制,在京城的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,并在各省设立铸局。清顺治元年(1644年)开始鼓铸“顺治通宝”铜钱。清前期的几代皇帝吸取元、明因开矿引起动乱的教训,一般都严厉禁止开矿。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,人口的迅速增加,货币需求量随之剧增。因此,解决日益剧增的铸币所需的铜料,成为关系财政金融稳定而亟待解决的大事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海禁开放,中国铸币用铜就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。但好景不长,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,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实行“锁国”政策,严禁船只出港,包括铜矿在内的各种矿产资源也严禁出口,清政府铸钱所需之铜只得转而依赖国内矿山。

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,其中铜矿储量丰富,“滇多矿而铜为巨擘”(吴其浚《滇南矿产图略》),开采历史尤为久远,早在32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已进行开采和冶炼,至明嘉靖年间所铸“嘉靖通宝”钱币则宣告滇铜铸币历史的开始。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《筹滇十疏》,提出以滇铜之丰饶,应“鼓铸宜广也”、“矿峒宜开也”的理财之策,建议大力增设铜厂,广泛开采铜矿,得到朝廷采纳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,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,为各省采购京铜创造了条件,初步形成了云南铜矿业采、供一条龙的体系。

与此同时,从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到雍正八年(1730年),长达31年在东川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,极大地推动了东川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,东川铜矿业进一步兴旺发展。雍正四年(1726年),东川从四川划归云南,同时增开汤丹等厂,铜厂大旺。一向注重矿山建设与开采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朝廷:滇省增开汤丹等厂以来,铜产量大幅增加,除了本省使用,每年有余铜200多斤,官方无力采买,建议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铜,再



会泽县文管所收藏的宝钱铸造局铜铤



道光《云南通志稿·卷七十六·食货志八之四·矿厂四·京铜》(局部)



会泽县文联提供



会泽白雾村滇铜京运路线示意图 刘鸿燕 摄

“转运至江南等省,令收买还项”。这一奏疏得到朝廷批准:“将滇省余铜,令该督勦盐务银六万两买,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,以备湖北、湖南采办之用;以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,以备江苏采办之用。”雍正五年(1727年),东川所产之铜外运汉口、镇江,然后转运北京,标志着滇铜京运正式开始。

乾隆三年(1738年),朝廷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,更大规模的滇铜京运随即拉开序幕。

滇铜京运的路线

乾隆六年(1741年),清廷最终核定云南每年运出京铜数量为633.144万斤,分别运往寻甸、东川两个铜店,出境后转运北京,“自滇至京,长途万里”。滇铜京运的全过程,包括分运、递运和长途三个阶段。分运是指从各生产厂运送至收购和储存铜料的地点即铜店,递运是从各铜店依次运到四川泸州铜店(泸店)、铜厂大旺。一向注重矿山建设与开采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朝廷:滇省增开汤丹等厂以来,铜产量大幅增加,除了本省使用,每年有余铜200多斤,官方无力采买,建议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铜,再

厂经林家渡(今板河口下游)渡过小江,再经新厂、小江口、尖山沟、尾坪子、焦家坝、大村子、热水塘,渡以礼河进入东川铜店,或再由东川经待补、大水塘、功山至寻甸铜店。由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,分两条路线运往四川泸州铜店(泸店)。寻甸铜店路线:由寻甸取道宣威,经威宁、镇雄到泸州;东川铜店路线:大水沟厂、碌碌厂等铜厂的铜料沿摆卡梁子运至小江口象鼻岭。

鉴于陆运成本较高,为节省运铜成本,乾隆五年(1740年),云贵总督张允随报请修浚金沙江为运铜水道,同时修整陆路。次年,水运开始。然而,金沙江滩险流急,巨石暗礁无数,运铜船只时有触礁沉船事故发生,铜料损失巨大,遂于乾隆十四年(1749年)停运。而后采取分段通航的方法进行水运,持续一段时间后,核算成本仍比陆运成本还高,于是,运铜上半程又改为陆路为主。

铜运改程后,铜料仍在象鼻岭集结,由马帮装驮,过小江,沿大湾子爬高家坪经云峰进纳姑达白雾,再由白雾至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,巧家富绅刘汉鼎捐资修筑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,古道

起自小江口,终点为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。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道成,“较旧近二十余里”。此后,运铜马帮和民间往来均改行此道。京铜运至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办理通关文牒后,即由会泽北上昭通,经大关、盐津豆沙关直达泸州总店。至今,会泽县娜姑境内仍留有两段保存完好的铜运古道,一段为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,另一段为云峰铜运古道,均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滇铜运到泸州后,陆运基本结束,开始水运。运铜船队从泸州起航,至扬州仪征市大运河口起航,大船满载京铜帆江北上,在通州上岸,到京城户部和工部交货。至此,一次完整的滇铜京运始告完成。通常情况下,东川府每年运铜4次,从泸州至北京水运路段,每次有8支船队,每支船队13艘大船,每艘大船运铜6万余斤。陆运则需马匹9000余匹次。每起运的期限,大约为一年,交铜后,从京城返回云南的时间限定为99天,延误或超期都将受到相应的严厉处罚。据《云南铜政考》一书统计,滇铜京运陆路2200余里,水路8200余里,全长万里之上。

滇铜京运的贡献

滇铜京运为国家财政金融作出了巨大贡献,云南也因此具有了全国性的战略地位,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清代东川乃至云南全省,铜矿生产占据了全国十分重要的位置,仅以乾隆、嘉庆时期来看,“云南作为全国的铜原料供应地,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5%”。滇铜京运保证了清廷铸币所需大量原料——铜料的供应,为支撑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,作出重大贡献。《清高宗实录》载:云贵总督爱必达奏称:“其汤丹、大保等各厂二十五四年,办铜二千六百余万两,共得课息银五十万余万两。”随着滇铜京运的进行,清政府每年向东川府所征税银由300余两增加为50余万两甚至到乾隆中期的100余万两,其增长之迅猛,对国家财政贡献之大,可见一斑。

滇铜京运的影响

滇铜京运对云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滇铜京运将云南与中央乃至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,云南在稳固和促进清王朝财政金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,云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也得以飞速发展,出现了“迁人聚利纷沓至,运货芟茅安并白。顿令空谷成市蜃,铃驮骈闻车轂”的空前繁盛景象。

政治影响。由滇铜京运带动形成的农矿并举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,催生了一些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,尤以享有“万里京运第一城”美誉的东川府(今会泽县)为显著。因矿业兴旺和滇铜京运,推动了东川府由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,转变为农矿并举的经济模式,经济社会长足发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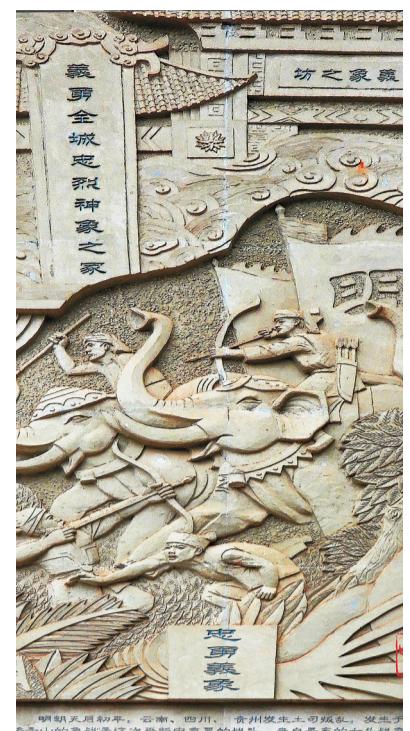
经济影响。滇铜京运直接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、冶炼、铸造、加工等铜矿业的迅猛发展,引发了清代的移民浪潮,陕西、甘肃、安徽、江西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等10余个省份的富商大贾、贩夫走卒、矿工、工匠、民夫、文武官员云集于云南。云贵总督张允随曾于乾隆七年(1742年)和乾隆十一年(1746年)先后奏称:“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,皆赖开矿走厂度日”;“滇省……惟产地五金,不但滇民以为生计,即江、广、黔各省民人,亦多来滇开采”。滇铜京运带来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,构建起了云南多元和谐的文化格局。如今,素有“万里京运第一站”之誉的会泽白雾村尚存的会馆、文庙、清代四合院以及四合五天井、走马转角楼、三坊一照壁等诸多建筑样式,就是滇铜京运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、交融、和谐共生的历史见证。

(作者单位:云南省社科院历史、文献研究所)

> 云南故事

明代马龙象战

杨增外 文/图



马街头由云南艺术学院教授郁川设计制作的《忠勇义象》浮雕

明天启年间,马龙州(今曲靖市马龙区)发生了大象参加平定地方叛乱的壮举,可算一桩旷世奇闻。万历年间,奢安之乱横扫川黔,西南大地狼烟四起。天启五年(1625年)三月,土司安效良纠集水西、古蔺两股地方势力再掀战乱。五月,水西土酋军队数万人抵沾益、占曲靖,抢掠民众财物,一路烧杀到马龙。

面对严峻的战乱形势,时任云南巡抚闵洪学一面表奏朝廷,一面令布政使谢存仁、副总兵袁善、参将尹启易及本地土司等,率兵数万抵达马龙平定战乱。初始,水西军人数众多,明军势单力薄,局势危急。在此关键时刻,景东傣族陶氏知府受命率精兵千人及训练有素的7头战象,日夜兼程赶到马龙,支援平定战乱。两军会师后,陶土司按照7头战象各自的体形,分别给它们披上铠甲,又在战象的两根长牙前端捆绑锋利的剑刃,剑刃能随象牙前后左右自如挥动,7头战象聚在一起,像一座环立的小山,阔步向前如土山滚动。

战斗开始,陶土司指挥气宇轩昂的大象走在各路军队的前面,迎战汹涌而来的水西军。象队作前锋,加之陶土司的上千精兵参战,明军士气大振。双方在马龙南面的松子山至北面的轿子山一带约8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激烈厮杀。据《滇游记》及《滇黔游记》等史载:战斗开始时,大象按照周密制定的突袭策略,白天潜伏山洞,日暮月黑风高,7头大象以鼻吸泥水斛,突然发起攻击,咆哮跳跃,直抵水西军战垒鼻喷泥水,并卷一人掷空坠下,其他人不知有如天降的是何庞然大物,因此惧怕而自相践踏。战象乘势分队奋勇向前,挺矛追杀的长牙,配合着利刃,威风凛凛冲向水西军阵地,真有撼山崩地、摧枯拉朽,所向无敌之势。水西军中的被象鼻卷起抛向空中,有的被尖利的象牙和绑着的剑刃刺穿,有的被圆柱似的象腿踢翻、踩踏……

明军鼓角齐鸣,乘势冲锋,喊杀声震天动地,水西军慌不择路,溃不成军。此时,安效良咬牙切齿,下令放出毒箭。一头冲在最前面的战象中箭,剧烈疼痛使它怒性大发,在阵中横冲直撞,巨身所至,势不可挡。经过五天的激烈厮杀,明军在轿子山的南面打败了进入马龙的水西军,全胜凯旋。再看这7头战象,其中一头战象,身上所中箭密麻密麻,取下的毒箭有一箩筐,射入皮肉的液体渗进了大象体内,这头大象坚持了三天不幸毒发而亡。另6头大象,虽也不同程度中箭,但总算幸免于难。

马龙主政者告知全州各界,择黄道吉日,把阵亡的这头战象隆重下葬在马龙州城北面,令石匠刻石立碑,传诵其功。天启七年(1627年),墓碑落成,碑正中题写“勇全城忠烈神象之冢”,两侧碑文铭刻了战象的不朽功绩。

明代马龙人杜其渐,写了《义象传》,说这头身中毒箭仍然“争先陷阵,死无二志”的大象,就是著名勇士孟贲,夏禹也会“遇之其丧胆”,“熊虎当之亡其魂”。论其威,则项羽之破釜邯也;论其烈,则赵云之战汉水也;论其功,则信陵之救邯郸也,论其死,则张巡之睢阳也。杜其渐认为这头大象是正义的化身,其功绩足以流芳百世。

明崇祯四年(1631年),到云南任巡抚的王岱途经马龙,专程到义象墓地凭吊,感慨不已写下四首绝句,称赞“分明物亦凛王征,一代关河九死争”,命令在象冢前建造牌坊,匾额题写“忠勇义象之坊”。进入清代,还有不少人前往拜谒义象墓,写下了《义象歌》《象冢铭》《马龙州义象冢》等诗文。

如今,明末建成的义象冢及牌坊已经不存在,但忠勇义象的故事和精神,仍在马龙大地传颂。(作者单位:马龙区委农办、农业农村局)

要与民间验辛苦

欧阳锡龙



宋湘画像及其行书对联

看。”“青苗收槁易,黄土葬人难。”他到达曲靖时,当地正处于秋涝,田野如同汪洋,不少民房被毁。宋湘心急如焚,立即组织抢救救灾,号召民众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,水患旋即得到治理,受灾百姓妥善安置。

宋湘经常走访民情,访贫问苦。马龙州地瘠民经济萧条,百姓仅靠农业谋生。他悉心策划,带头捐薪购买棉籽,安排专人指导当地乡民种植棉花,并立即筹措资金购买纺车500台,无偿分发给百姓,让妻子教他们纺纱织布。通过种棉、织布,马龙乡民收入提高,生活得到改善,并带动相关手工业发展。马龙百姓深记宋湘政绩和厚德,把所织之布称为“宋公布”。

广南府百姓用水困难,宋湘捐款并亲自勘测水源,开凿东、西两塘引入水至城,供百姓饮用。在大理代理西道尹时,饥荒瘟疫并行,他又捐俸银抵恤百姓组织自救,自购松籽3石指导百姓植树造林。宋湘在大理手撰“种松诗碑”,其中就有“一粒丹砂一鼎封,一枚松子一株松。何时再买三千石,遍种云中十九峰”的诗句。在永昌府时,他捐俸银170两修复书院,每年培养学子数百人。

“诗人自有诗家法,得失千秋一片心。”作为书生官员,宋湘绝不向地方黑恶势力妥协,史载,保山县湾甸土州的景在东侨奢横行、鱼肉乡民,长达五六十年,但当地知县胆怯不敢上报。宋湘出

得百姓好奇围观。这让他愧怍不安:“官船过处人环目,老妇幼儿排簇簇。直教看杀老东坡,彼自殷勤我感恩。……我今前去滇南守,知是豺狼是父母?竹马无情呼不來,车乘翹翹畏我友。”他也自惭自责:去云南赴任,不应该像豺狼那样,而应该像父母那样,对得起百姓和自己的良心。

宋湘以诗言志,廉洁自律,从来不玩虚的。在走访乡村时,他发现权势人家的牲口糟蹋百姓庄稼不误赔,情况愈演愈烈。宋湘要求各村制定村规民约,无论何人放牧,如果损坏庄稼必须赔偿。他自己身体力行,有一次他和随从送妻子到马龙教授织布,不留神马吃了几十株秧苗。宋湘马上叫随从把所损秧苗总亩数按成熟稻谷价计算赔偿。此事很快传遍曲靖各县,此后随意放牧糟蹋庄稼的事就很少发生。

以诗言志 廉洁自律

《清史稿》《广东通志》《嘉应州志》均记载,宋湘一生俭朴,把薪俸大部分捐给地方公益事业,他自己却从未给家乡旧居增一砖一瓦,未给予子孙谋一官一田。

宋湘为人清廉,勤政亲民,体恤民间疾苦。这一作风,与宋湘自幼接受的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影响很有关系。青少年时期,他得益于多位名师的启发引导,长期熏陶于儒家学说,潜移默化间

习得良好道德品行,懂得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大道。“连朝风浪阻征期,三尺篷窗一酒卮。逢闷无如开卷好,对公真悔读书迟。先忧后乐人何语,去国怀乡此日知。”(《南行草·舟中读范文正公(岳阳楼记)》)诗中记述宋湘南下赴任曲靖知府,在长江上遇大风大浪困在船内,与其无聊浪费时光,不如认真读书。对他范仲淹有崇敬之情,自悟“读书迟”而惭愧。

宋湘认为,凡是对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,都是应该学习的楷模。他倾慕陶渊明的人品,也喜欢杜甫,“一生心醉陶彭泽,暗地师资杜少陵。毕竟还要真面目,人豪才是戒来僧。”宋湘饱读诗书,博闻强记,善于思考,并把平生所学用于实践,最后达到了“读书果有用,遇事乃效能”的境界。

道光五年(1825年)冬,宋湘升任湖北督粮道员,次年(1827年)在武汉卒于督粮道任所。家人检点宋湘遗物,家徒四壁,存银无几,仅书籍数筐、佩刀一柄、画像一幅,外加《红杏山房诗钞》木刻版数百页而已,其清廉由此可见一斑。

(作者地址:浙江省龙游县)

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
云南日报 联办
云南廉政研究中心

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

云南古代清官廉吏